



上医校友会简报

【2015】第6期（总第34期）

上海医科大学校友会编

2015.09

母校新闻

校党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 会前宣布教育部任命

8月31日至9月2日，中共复旦大学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前，校党委书记朱之文受教育部党组委托，宣布了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经教育部研究决定，任命包信和为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张志勇为复旦大学副校长。另经教育部党组与中共上海市委商得一致，张志勇同志任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委员、常委。

新闻链接：

包信和，无党派，1975年7月参加工作，复旦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科院沈阳分院院长。

张志勇，中共党员，1982年2月参加工作，上海医科大学影像诊断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曾先后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兼党委副书记，上海市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主任。

汪昕同志任中山医院党委书记

8月21日下午，中山医院干部大会在五号楼六楼会议室举行，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沈炜、市委组织部宣教科技干部处处长夏明林、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副书记陈立民出席会议。会议由陈立民副书记主持。会上宣读了市委的干部任免决定，任命汪昕同志为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各级党委充分肯定秦新裕书记多年来的工作成绩，由于年龄原因秦新裕同志不再担任中山医院党委书记。

汪昕，1979年9月参加工作，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医学博士，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中山医院副院长。

我校迎来2015级新生

8月底，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余位本科新生，5000多位研究生，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本科，研究生留学生，走进复旦，开始了他们的大学生活。其中，医科本科新生632名（其中临床医学（八年制）141人、临床医学（五年制）138人、基础医学、法医学62人、预防医学110人、卫生事业公共管理15人、药学110人、护理56人），研究生新生1300名。



今年，学校从新生学习需求和生活需求出发，以信息化手段为主要方式，将相关教育和服务内容整合到迎新服务系统，并于新生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第一时间上线，实现学生培养在入学前和入学后的无缝衔接，更好地了解 and 融入校园生活。并继续加大力度，完善经济困难新生“绿色通道”，推出多项举措，确保家庭经济困难生安心报考，顺利入学。研究生院编印了《研究生学习和申请学位基本文件汇编》、《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参考大纲》（全国宣讲领导小组编写），在报到当天发放给新生使新生尽快了解研究生阶段的管理规定和培养要求，进入学习状态。

肿瘤医院医学中心项目正式开工奠基

近日，位于浦东上海国际医学园区的肿瘤医院医学中心项目正式开工奠基。奠基活动由党委书记李端树主持。2013年3月市委、市政府决定，为进一步有利于质子重离子医院的运营和发展，整合资源促进肿瘤医院学科发展，将原规划在闵行华漕医学中心项目整体迁至浦东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内。医学中心核定床位600张，开放床位800张，总建筑面积95469平方米，预计将于2018年建成投入使用。项目建成后将涵盖医疗、科研、教学、行政和后勤保障等功能，以基本医疗功能定位，将一定程度上满足全国和上海患者的就医需求，促进肿瘤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中山、华山医院2015年国家医疗队”开展巡回医疗活动

为贯彻落实国家卫计委《关于进一步深化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的意见》和组织2015年国家医疗队赴相关地区开展巡回医疗工作的要求，我校中山、华山医院组织了专家医疗队赴新疆伊犁州新源县、云南迪庆（藏区）地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巡回医疗工作。

据介绍，“国家医疗队”巡回医疗项目旨在发挥城市优质医疗资源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改善中国“老、少、边、穷”地区缺医少药的严峻状况。中山、华山医院“国家医疗队”代表

中国最高医疗水平。本次巡回医疗中山、华山医院整合了普外科、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皮肤科、眼科、骨科、泌尿外科、心内科、血液科等科室的 14 名专家和骨干医师。

“国家医疗队”在伊犁州新源县、迪庆藏区的一个月里，为当地积极开展义务咨询和健康体检等义务活动，强化和培养当地医生，切实提高当地的医疗水平和医院管理，造福当地百姓，并为当地医院“造血”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我校 47 位离休干部获抗战胜利纪念章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时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我校 47 位离休干部（其中原上医离休干部 37 位，原复旦大学离休干部 10 位）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抗战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具体名单见后）向革命前辈们致敬。

9 月 2 日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健在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或其遗属颁发纪念章。这次纪念章发放的对象是下面五种情况：一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各地游击队健在的老战士。二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地方工作和地下工作的健在的老同志。三是曾在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战并于解放战争时期及其以后参加革命工作（或入伍）以及回乡务农的健在的老战士、老同志。四是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海内外爱国人士、抗战将领中的代表人士。五是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中的代表人士。2015 年 1 月 1 日后去世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在此次发放范围之内。

获抗战纪念章的我校离休干部名单（△为原上医离休干部）

张令仪△	胡书琴△	邹剑秋	韩 涛△	石 坚△	王 益△	陈 放△
陈家珍△	杨 林△	林世英△	曹文明△	王先政	辛成楠△	卫 桑△
孔芝兰△	汪枫叶△	张金鼎△	王 萍△	于翠松	李建军△	杨云峰△
林 卿△	陈 泓	夏 林	彭玉德△	张 罗△	郁 震△	王松歧△
顾 展△	沈 静△	牟晓明△	张熏华	徐耀其△	蒋 云△	余开祥
唐文华△	欧天于△	赵彦明△	纪俊才△	丁 朴△	朱守信△	陈文函
汪如龙	刘开富△	蔡荣林△	屈志伸△	李超明		

（摘自《复旦》新编第 1038 期）

上医战时内迁小史

1937 年上海沦陷后，上医的教学收到严重影响，一度中断。1939 年初，学校决定内迁云南。

内迁是分批进行的。同年 9 月，上医高年级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从上海乘船经香港到越南海防登陆后，乘滇越铁路前往昆明，并继续为当地战事救护。

待到 1941 年，上医又从昆明迁至重庆歌乐山。学习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滇缅公路被切断后，医学院的纯酒精就断货了。

谷镜汧，这位中国病理学的奠基人，只好亲自用废酒精液蒸馏提炼纯酒精，结果把脸烧

伤了。医学院实验用的玻璃器皿，也是教授们带着学生自己烧制。条件简陋，但教学质量一点儿也不差。当年的上医学生回忆说，那是一个把解剖课能讲活的时代。

内迁之后，很多人的家庭经济来源断绝了，不少学生开始卖血，大家都是这么坚持着。直到 1945 年，胜利到来。1946 年，上海医学院从重庆迁回上海。

（文/杨震）

淞沪会战中的上医战地救护队

1937 年 8 月 13 日，淞沪抗战来开序幕。战前，时任上医校长的颜福庆被推举为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席，总负责全市救护工作。

他发动学校的广大师生和医务人员组织医疗救护队，奔赴抗日的前方、后方，为伤病员服务。

成立第一、第二救护队员

此前，上医师生已有多次战地救护经验。1932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上海医学院动员全校师生参加战地救护。在闸北前线抢救伤兵时，大三学生陈化东右臂中弹受伤。

在空前的民族灾难面前，师生踊跃报名参加医疗救护工作，组成。

第一救护队。

第一救护队是流动手术组，邵幼善、黄家驷医生任正副队长，成员有崔之义等内外科医生、护士、药剂员 20 余人。他们在无锡郊区设立临时医院，收容从上海水路、陆路运来的重伤员，进行扩创、石膏包扎、抗感染等处理，待伤员病情稳定后再转移到后方。

10 月，上医师生又组织了第二救护队，纪长庚任正队长，而副队长是五年前挨过日军子弹的陈化东。第一、二救护队在上海救护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救护工作，成为红十字会救护队的骨干力量。

战争迫使高年级学生一夜之间变成医生，他们每天要面对的，是无数的伤兵，何时无麻药情况下大量的截肢和扩创术。

11 月中旬上海失守后，两支救护队改编为四队，撤退到内地。邵幼善、崔之义、纪长庚、陈化东分别任一、二、三、四队队长。

一、三、四队乘轮船扯往汉口。第二队留守南京，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两天才撤退，在武汉与其他三队会师。

抗战中的上医人

从 9 月 20 日开始，上医的枫林护士宿舍（外交大楼）改为伤兵分发站。从前线运到上海的伤兵，至少每天 300 人，多则上千人。伤兵先进站，根据伤势轻重，分别处理。重者送医院，轻者暂住站内，等火车或轮船送往后方。

从 9 月 21 日到 11 月 8 日，外交大楼共计收容伤兵 17940 人。11 月 9 日，外交大楼最后一批伤兵 300 余人安全转移到租界。半小时后，日军攻入中山医院，轰击南市，枫林桥沦陷。

淞沪抗战三个月期间，上医的教学医院红十字会第一医院改为特约医院，中山医院改为第六救护医院。

由上医负责或领导的还有第一、二、六、二十三救护医院，后方第一、二医院，国际第一、二、四医院。以上医院于 1938 年春陆续结束，共计收容伤员 7000 人。

自 1937 年 8 月 14 日至 1938 年 4 月 30 日，由上海市各医院收治受伤民众和士兵 19539

人，其中由上医收治的占了总数的近 30%。

（摘自《复旦》新编第 1038 期“与时代共命运，与民族同患难：抗战烽火中的复旦上医”）

校友工作动态

校友顾履冰受邀参加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大会天安门阅兵观礼

2015 年 9 月 3 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上医 64 级卫生系校友美国埃默里大学教授、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顾问顾履冰受邀参加了纪念大会等活动，现场见证了大阅兵激动人心的宏大场面。



据悉，此次受邀来京观礼的海外侨胞代表有 2000 人，来自世界各地的 135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既有对抗战有重要贡献的侨团代表，也有海外重要侨领和华侨华人各界精英。顾履冰教授表示受邀参加阅兵观礼，不仅为了缅怀先烈，告慰英灵，牢记华侨先烈居功至伟的英雄业绩，唤起善良的人们对世界和平的坚守，更是为了继承传统，教育后生，希望海外侨胞不忘血脉中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情系祖国和家乡，为促进中外友好交流合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另悉，上医 80 级（4）班校友，南方基因中心医学基础科学家黄薇也受邀参加今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校友会整理）

上医卫生系 78 届 2 班校友聚会

四十年前，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从冀黑沪苏浙皖赣鲁豫粤川各地的农村、生产建设兵团、工厂、卫生单位及部队，聚集到申城枫林路上医校园。



他们在校的三年，正是祖国政治上最波荡起伏的时期，但三年与母校师长名家们朝夕相处、亲身感受并体验了老师们的渊博学识。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为他们毕业后在各自工作岗位及专业领域作出贡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毕业之后，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认真学习、努力工作，终于有所成就、有所建树、有所贡献。三十七年来，他们虽然各分东西，星散四海，聚少离多，有的甚至从未相见，但谁也忘不了丰富多彩的母校生活。时光荏苒，岁月沧桑，三十七年过去，从青年到中年，青丝染白，格外思念同窗和恩师，分别愈久，相思愈深。

2015 年 7 月 19 日，他们终于将思念化为行动，1978 届 2 班的近五十位同学，从世界各地，汇聚到他们曾经聆听老师上课的教室，在相识四十年后，尽情享受再聚会的欢乐。他们请来了当年的老师：俞顺章、郁庆福、陈秉衡、洪传洁、龚幼龙、胡善联、陆瑞芳、邵玉芬、柳启沛、金锡鹏、詹绍康、陈自强、钱超、奚兆永等各位教授和班主任徐勋老师等。他们还委派代表上门看望了王簌兰教授。他们向老师送上了真诚的祝福，并向老师们汇报了各自的工作成绩。



公共卫生学院领导热情接待了各位校友，陈文院长向各位校友介绍了学院这几年的发展情况，学院发展的总体目标，还介绍了枫林校区校园基本建设规划。并真诚地邀请校友学长，

为学院的发展出谋划策。校友为学院的发展由衷地感到高兴并祝福学校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早日跻身世界一流水平，他们也愿意为学院的发展尽自己一份力量。

（公共卫生学院）

校友随笔

我的“内迁日记”

陈忠年

1942年六月下旬，在经过了约两个月的不寻常的旅途，我们终于到达重庆。卡车在海棠溪渡过长江后，把我们送到歌乐山下的街上。但是几声谢谢和再见是无法表达我们对司机叔叔由衷的感激心情。正在街上的同学见到我们便立刻上前帮助提行李，一起走上山路石级，见到一块竖立的横牌写着国立上海医学院。这对我们是多么亲切、不少同学出来迎接我们这几个风尘仆仆的学生的到来。

校园巡礼和生活

我们一到学校，二位高班女同学便忙着要为我们洗头。原来旅途中几乎不可避免地都长了头虱。头虱很顽固，肥皂水洗不掉，非得用手指甲捋去。清洗后也是由她们领我们去安顿铺位，并介绍这里的生活情况。当时，宿舍全是简陋的平房。就地取材，以粗竹竿为屋柱；以石块条为地基，上铺填泥土为地；以竹片条编成墙，再涂以石灰和纸筋；用厚层稻草覆盖为屋顶。窗框为木格条，没有玻璃而是糊上棉纸，涂上桐油。这种窗透光当然差，但防雨水却还很管用；开启时只需用小木棒支撑即可。我爱睡上铺，比较清静，常临窗远眺，读笔记，看家信，想念家人。我们三餐均由学校免费供应，此外生活用品如草纸和照明用的油灯、油、灯芯也都由学校按时发到宿舍。我们的饮食很简单：早餐为薄稀饭和盐水蚕豆；中、晚餐是粗米饭，内有不少沙子、稗子，和水煮胡萝卜或赤豆一碗，供一桌共用。每周一次打牙祭是同桌合买的一碗红烧牛肉。有的同学常去校外饮食店加餐，最常去的是江苏小食店，是下江人开的，店里的牛肉面价廉物美合我们胃口。我们常去厨房要一碗米汤，如同喝牛奶。歌乐山冬天冷湿多雨，终日离不开套鞋和雨伞，即使在屋内，因为是泥地，也得穿上套鞋。夏季炎热，烈日高照雨水少，水很紧缺。我们用的水是由工人挑来的。我们每人每天只发给一瓢水，约大半脸盆，十分宝贵，要一水多用。使用水的方法是先用明矾将杂质沉淀除去，首先用作洗脸，待傍晚则用作洗澡或称擦澡，最后洗衣服，真是水尽其用。男同学则自己翻过小山到龙洞湾泉水处或在井边痛快地洗一番。这对我回上海后，以至在21世纪的大城市中仍然节约用水不无关系，水来之不易啊！学校的厕所都盖在半山，是完全蹲式或坐在木板上，居高临下见到一片粪坑，面上有无数蠕动的蛆，这我们一路上已见惯了。我们带来的皮鞋已破，在重庆买的大多是纸样皮，用糨糊上的，因此常遭受鼠咬。我们的皮鞋特点是后跟缘呈鼠咬状的花边缺口。我们只能将皮鞋挂在竹片编的天花板上才安全。

我们的教室

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上课，在哪里上课，一直还未见到教室。原来我们吃饭用的大茅草棚就是教室。这才是“多功能”的地方：三餐时为饭厅；白天是教室；夜晚是自修室；

周末是图书室；节日、开大会是礼堂。上课时，有一块黑板放在左前方，中央为一有两小抽斗的长方桌就是讲台，用餐的八仙桌和长板凳是课桌椅。不久，学校在山顶建造了二座长方形的教室和实验室，是砖瓦屋，有明亮的玻璃窗，成套的课桌椅。有一部分教师的办公室兼卧室也在山顶是砖瓦房。课间休息时，我们常从山顶快速下坡直达公路旁而不走石级。上病理、微生物、寄生虫学时，每个学生都有一架显微镜；成绩在前三名者给予使用质量好的显微镜作为奖励。山上尚有放置标本的小屋，内有老师们精心收集的地方病标本和教学用标本。



老师帮学生

上海医学院虽在内地，时值抗日战争，但我们引以为骄傲的是学校拥有一批真才实学、经验丰富、教学有方的老师。大多数老师是经过留洋深造的医学科学家。在前期基础医学中最早学习的课目是化学和生物等。化学老师郑兰华十分重视化学实验中的基本操作，即使有助教，他也必亲临实验室对学生逐一检查，看他们是否学到了基本功。生物学老师陈世驥的讲课条理清楚，英语字眼清晰，讲述速度适中，边讲边在黑板上绘图示意，使学生能全部用笔记下和理解，感到学得很扎实。他们为我们进入人体的知识课打下良好的基础。人体解剖学老师齐登科，他师从张璠教授承袭了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画出浅层至深层解剖的立体状图解，齐老师找某一支血管、神经正确无误。组织胚胎学老师王有琪对胚胎各器官之复杂不同的发生、演化之过程，了如指掌，随口可述。王老师对神经解剖学更是专长，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结构，不论是外观、剖面，自大体到镜下，其名称、部位，与周围都是滚瓜烂熟，令人折服。病理学老师谷镜汧热爱专业，不顾遇到的困难，想尽办法为教学和科研积累了不少地方病标本、罕见标本和典型标本。难怪后来当他听到装有标本的轮船于返沪途中遭难、沉于长江时，他伤心得流泪了。寄生虫学老师毛守白为了让同学喜欢学，学得好，他自己画了许多虫体解剖及生命周期挂图。他以后为上海中科院寄生虫病研究所所长。药理学老师张昌绍，兼任中央实验卫生院(相当于科学院)的研究工作。他从那里的资料中获得的新的药物知识也有介绍给我们，如青霉素(Penicillin)。

后期临床医学的老师中，对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外科学沈克非老师。他的讲课内容深入浅

出，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对警句十分强调要我们牢记，如急腹症在诊断未明确前，绝对禁忌用镇静、麻醉剂。课文中有生动实例来加深印象；也有应用日常所见所知的来比喻疾病症状；也有以幽默语言来调和课堂气氛。可见沈老师备课所化心血，以及他的高水平中、英文根底。在临床从沈老师总查房中，给我们不少的宝贵经验；他不时地考查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使我们在查房前夕不得不做好充分准备，以免被考倒。儿科学老师陈翠贞一口流利英语，讲课时从不看讲稿，而其内容完全与当时 NELSON 所著儿科学相符。内科学老师钱惠在讲阿米巴脓肿的诊断时，强调医师应从抽出的脓液仔细观察，取得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使我们终生难忘，并在自己的工作中深深体会。后期临床课程中物理诊断学老师余南庚是上医毕业生，老校友，他的英语口语清楚，教我们视、触、叩、听的操作方法步骤，动作十分准确。可惜他后来去美，他在那里成为心脏内科专家并担任美心脏病学会会长。

当时在歌乐山任教的还有应元岳、冯德培、黄家驷等教授，可惜我们班没有机会聆听他们的讲课。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歌乐山国立上海医学院的任教老师们，不论前后期都有共同特点：首先，他们都是忠诚于医学教育事业：体现于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尽心尽力上好每一堂课，带好每一次实验。对学生严格要求，做到一丝不苟，因为今日的学生就是未来的治病救人的医师；后期临床教学老师在带教、传授临床知识和经验不遗余力，各级医师层层带教坚持不懈。其次是安于清贫寂静的生活：不少老师是远离亲人，随校内迁歌乐山；有的是举家落户山区。虽生活艰辛，清苦度日，但没有一位后期老师想到悬壶行医，以弥补不足之处。这是首任院长上海医学院创办人颜福庆博士所着重的不为名利，只为病人的精神。这些都是上海医学院的优良传统，一直保持下来。

当时上课都是用英语讲解，我个人的理解是上海医学院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医学院(国内其他医学院如协和、湘雅、华西、齐鲁、同济是洋人或国外教会办的)，那时尚缺乏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教材书籍，而老师们对英语教材参考书更为熟悉，那时也没有中文医学术语的成套规范材料，因此老师们对应用英语讲课更为方便。

由于缺乏书籍、参考书，我们把老师在课堂上的讲述、解释、图解都一一记下，成为我们的教材。因此听课时必须全神贯注，一字不漏地记写，然后再整理，成为我们的笔记本即“课本”。因此形成了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的系列学习步骤。我们把笔记本作为我们学习的命根子，所以每次开学前，大家忙于买纸订本。那时内地廉价纸粗糙，如同草纸，吸水力很强，纸又是呈浅褐色或淡红色，因此用墨水很费。我们的墨水是用粉末冲成，为节约而冲得很稀。但我也珍藏有少量白色道林纸，只是在听最精彩的课时才舍得拿出来用。在重庆的学习生活使我至今仍爱惜纸张，从不丢弃尚有空白之处的纸张，正反面尽量利用。我们到歌乐山开始上课时，我们班上还来了八、九位香港大学的医学生。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占领了香港，有一批港大医学生，不少是印尼华侨后裔，由他们的英国老师妇产科专家金戈登(GORDEN KING)带领，辗转内地，投奔上医，也可见他们慕上医之名，而对她们情有独钟。昔日富家子弟，今日落难学生的港大同学，还是很乐观，愿与我们一起在歌乐山学习。他们常苦中作乐，喜欢坐茶馆，虽囊中羞涩，但如其中一人卖血有所得，也必大家一起去吃一顿，加加油，有福共享。

夜自修

如上所述，大饭厅在晚上是学生的自修室，学校备有汽油灯照明，可是常出故障而熄灭。

倒不如自备照明来得可靠。经济较好的同学自备煤油灯，或二人合一灯，也有用乙炔电石灯，但点时挥发气味难忍，故很少人使用。其次一类是用蜡烛照明，在宿舍内自修；第三类是在油灯下自修；第四类是干脆早早入睡，待明天早起到校园自然光线下早自修。我则采用第二、第四类办法。尚有一类特殊办法，是3、5成群，在白天带上笔记本到茶馆店去，边喝茶，边复习讨论笔记和上课内容。这种独特的自修方式是港大来的学生所“发明”的。因此他们的笔记本订得如日记本那样小，可放入口袋，随时可取出复习。当然他们记的内容要比我们记的简单而扼要。

后期或临床医学：它是医学教学不可分割的部分。课程由临床老师传授，实习课分见习生及实习医师两个阶段在医院、门诊等处，由临床住院医师带教。因此我们经常去医院。当实习医师时，食宿都在医院宿舍。上海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就在歌乐山医学院旁的中央医院，1945年起名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由于医院内有不少名医，故遐迩闻名。除了当地老百姓，还有不少当时政府要人或其家属来院治病，周恩来总理也曾住在这所医院内治过病。医院后来又建造了一个高大的石砖屋作为手术室，也曾有美国来的外科医师在此施行手术。

当时临床的主治医师除了治病，讲课外，还担任临床的检验工作，如朱益栋老师兼任检验室主管。他在去病房、门诊、教室以外，整天在化验室工作。肺科孙忠亮老师自己为病人作胸部X线透视。就是我们这些实习医师也包揽三大常规的检验工作：数血球、测血色素、查数白细胞的百分数，血片中找疟原虫、螺旋体、甚至黑热病的利多小体；要找粪便中的蛔虫卵、阿米巴原虫等。每个病房都有一个检验室，内各有显微镜、酒精灯、试管、血球计数器、比重计和一些试剂，但照明的还是油灯。记得我轮转到内科实习时，一个下午收进10个病人，亟待明确诊断。我忙得不亦乐乎，问病史、体检、写病史、采血、忙三大常规，夜晚独自在油灯下找出了疟原虫，回归热螺旋体和阿米巴原虫。终于在晚上10时过后一一确立了诊断。虽已精疲力竭，却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做医师的欣慰。在外科实习时，参加中小手术时，我们实习医师要做护士工作，选手术器械，在手术台上要穿针，递手术器械等，还要快、准、稳，十分紧张。那时在医院不论职位高低，往往需要做一个“多面手”。

学术空气

尽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地处西南山区，但是上海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内的学术空气还是浓厚的。在医院每周有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称为C.P.C)，前后期经常有学术上的交流活动，每周一次医院内各科的总查房是由主任医师带领全科各级医师进行。这对我们实习医师，各级住院医师如临考试，需在前一天复习病史，复查病人，再做一次三大常规，测血压等和理论准备。当时的助理住院医师规定到其他有关科室进修和工作一个时期，如外科医师需轮流到病理课做助教工作半年至一年(在上医教学医院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的放射科医师首先要到临床病理科工作一年)直到文革时。

牢不可破的友谊

在重庆期间有的同学得了结核，染上伤寒，肝炎或住进病房或隔离疗养，同学都是远离家人，最需要同学的关怀和安慰。我自己在四年级时患了肠炎，没有住院，每天自己到半山腰茅房拉稀达10次左右，身体软弱无力。此时我同班同室同学周溶挑起了照顾我的担子，她出钱买鸡蛋，又自己煮给我以补营养。那时我们只能在油灯、酒精灯上以废食品罐当小锅煮此简单食品。半月后我才恢复，后来我表兄给我寄了些钱给我养病。还有一位港大印尼华侨

同学黄基识患了结核，单独一人在小隔离室，在重庆，他除了同学没有别人亲近，胡旭初每天去看他，或带些自己省下的食品如橘子，花生给他。过后不久，周溶患骨髓炎住入外科病房。病程缓慢，但又无法起身，我回报她对我的深情厚谊，每天去病房看她。她的经济来源全靠她母亲节俭供给，我只需帮忙购买些营养菜。我每天到山下街上饭馆买一盆炒菜送到病房。一年左右后，她患病处排出一死骨而告痊愈出院，在艰难中建立的友谊最为可贵。

告别歌乐山

歌乐山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艰苦而愉快的日子，但她究竟不是与世隔绝的，据说歌乐山的松林坡埋有被害革命志士的忠骨。离歌乐山不远有渣滓洞、白公馆隐藏着。有两个中学生因路过那里误入“禁区”而失踪了。当我正在重庆市立医院妇、外科实习时，那里发生了教场口事件，使我看清、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面目。学校内大张旗鼓宣传青年军，同学中有不明真相，热血方刚的青年报名参加。1945年比我们高一班同学提前毕业奉命调军医署工作。这在文革时，成为他们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军官的理由。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盟军胜利而告结束。我们归心如箭，为回上海而做准备，虽然学校会考虑这问题，但我们还是以同学，同科室人员自由组织成批返回上海。离开歌乐山前，不少同学，老师摆了地摊，卖掉些不用衣物用品，以补贴旅途所需。这时在1945年下半年歌乐山大放光明，有了电灯，可是我们却要走了。我与外科病房医师、护士同行。归途中并非一帆风顺。搭乘卡车时，遇国民党军队士兵强行爬上车来搭乘，我们说已乘不下了。这一拒绝遭来下一站祸害，那些兵记得我们车号，要实施报复，要强行拉人下车去受鞭打，经我们全体苦苦哀求并道歉才平息。之后我们经陕西省宝鸡、西安和河南洛阳、徐州等火车路线，后渡江到南京返沪。火车陈旧不堪，一路摇晃行驶，还常走不动，一停几小时，男医师们和交大男同学都曾下车推火车。一位交大学生还在那里墙上写着“交大学生在此推火车”以留念。有一次，火车乘不上，我们也曾露宿站台，经过四年的锻炼，这又算得了什么？！

1946年四月回到上海，见到父母，弟弟，不免喜极而泣。稍歇一、二天后便到海格路上海医学院附属红十字会医院，去补足最后两个月的妇产科实习课程。以后我一直以医院为家，周末才回去看我父母，从不住在家里，直到我结束总住院医师晋升为主治医师自己成家时。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医学院保持了原有的不为名利、脚踏实地、朴实严谨的校风并继续追求卓越。在她成立以来的75年中，为祖国培育了众多的医学精英，和一大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医务工作者，并在国内外医学院中赢得声誉。看到今日的上海医学院的莘莘学子在优越的环境和条件下学习是多么幸福，请珍惜这六年的医学院学习时机，为祖国的救死扶伤医学事业做好准备和作出贡献。

“谁说女子不如男，千难万险亦承担”

——记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张令仪



张令仪，山西省汾阳县人，1921年7月生。1937年11月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家庭环境优越，父亲是汾阳县名医。毅然投身革命，曾任少先队指导员、妇女部部长、鱼台县委妇女科科长、山东省姊妹剧团音乐股、编辑股股长。1942年在山东军区115师卫校学习结业后任山东卫生总局保健科科长、华东军区前方卫生部医政处科员、山东军区卫生部保健处科员、山东省卫生厅保健处科长、山东省助产学校副校长。1957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毕业留校任助教。后历任教务处、医院管理处处长。1985年离休。

到前线去

我是1921年出生的，和党是同年同月生。1937年，我在山西的汾阳铭义中学念书，后来八一三事变发生，高中读了两个月，南京失守。铭义中学在汾阳已经办不下去了，阎锡山的部队又跑到汾阳县城抢劫民财，人心不安。当时我们就跟着学校南迁，快到山西南边的时候，坐着汽车，就听见有吹号的声音。他们说这是八路军，那时不太了解，只听说是共产党，共产党是好的。那时听说八路军办了学兵队，我们就想，那还不如参加八路军。后来学校一直到了临汾，临汾城里学潮很厉害，阎锡山办了一个民族革命大学，也是为了抗日战争成立的，还有很多党派办的学校。

八路军办的学校离临汾有十五里路，叫刘村镇，我与同班温世娴、武文耀，主动辞别学校，直奔刘村，八路军学兵队接待的同志看到我们，说：“现在为了照顾统一战线，你们是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有个民族革命大学。”我说，“民族革命大学不是阎锡山办的吗？我们不去，我们不要去的。”接待的同志看我们这样坚决，说，“那这样吧，临汾有个叫丁玲的，她办了一个战地服务团，也是抗日的”，你们可以去。

第二天我们就到战地服务团去找丁玲团长，丁玲团长询问我们情况，我们讲是汾阳中学的学生，出来要抗日。可她跟学八路军兵队讲的一样，要照顾统一战线，还是劝我们去民族革命大学。学兵队不收，服务团也不要，我们几个很委屈，一想，不行，我们还要找学兵队！立马又回到刘村，这次接见我们的是一个长征干部，姓何，名何以祥。他是个教导员，我们就给他讲情况，表示要坚决抗日。他觉得我们很可怜，就问：“我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平时在学校里，都看什么书？”我们就讲了几本书，比如《新青年》这种进步的书。他问，“你们出来抗日，家里面知道吗？”我们说，家里一定会同意的！他又说，“你们知道，毕业之后是

要到前线去的，怕不怕？”我们连连说不怕，出来我们什么都不怕。何大队长笑笑，看我们实在是执着，就录取了。

在那学兵队里大概学了两个多月。由于中共北方局和驻晋办事处迁到刘村，许多课程由党的负责同志讲授：刘少奇同志亲自给我们讲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杨尚昆同志讲游击战的政治工作，还有陈克寒、李伯钊、彭雪枫等同志都给同学们讲过课。

印象最深的，记得一次行军几十里路，去听朱德总司令报告。我们先在操场上坐下来，大家说着朱总司令怎么还不来，看着讲台上已经有两三个人了。这时候台上宣布说：“现在我们请朱总司令作报告！大家就奇怪了，原来朱总司令早就在台上了！朱总司令穿着很朴素的军装，同学们在台下窃窃私语”，怪不得听说，朱德同志长征的时候曾经被国民党俘虏，他说他是炊事员，人家相信了，就把他放了。这些都是在学兵队里很有意思的事情。

旧日的闺秀变成新时代的英雄

学兵队的学习结束了。那时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考虑到我是汾阳人，要把我分配到离家近一点的汾西县，我坚决不去，表示就是要到前方。那时台儿庄大战正打的很激烈，学校就分配我们去台儿庄。

我们同行八个人，途径山西、河南，到了山东省中共地委所在地，先找到党的地委。地委的同志告诉我们，台儿庄战斗马上就要结束了，让我们先留在单县搞宣传工作。

1938年6月，单县失守，我们被分配到湖西抗日义勇宣传队。因为抗战初期，那一地方很封建，单县有个张寨，是个大地主的寨子，佃农、贫农结婚，新媳妇要被地主家的人享有初夜权，张寨村贫家的小孩子，要像狗一样驮着地主家的孩子去上学，压迫的很厉害。所以我们到那里，一是要抗日，二是要反对封建剥削。搞宣传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成的，很不容易。那时年轻妇女根本不敢出门看我们。有一次我们去地主的寨子，想进去做宣传工作，天突然下大雨，而寨门就是不开，宣传队大队长问我们，“你们冷不冷？饿不饿？”我们坚持说：“不冷！不饿！”“不冷怎么打哆嗦啊？”大家都笑了。我们坚持唱了一支又一支歌，终于等到了寨门大开，村民们给我们饭吃，让我们在那里搞宣传了。

1938年的冬天，因为成天走路，我受伤患病，不能随军行动，汪亚民队长让我先去李新庄的游击队李司令家里修养。忽然有一天，枪声大作，是汉奸队把我们包围了，区常备队只有二十多个人有武器，我们先跑到米陈庄，没多久，敌人三面包围，只好去地窖躲一躲，伪军是本地人，了解情况，知道有地窖，就发现了我们。伪军把我们关到三个地方，我一个人一个地方。

过了一天以后，警卫把我带到一个两进大院里，出来个女的，是伪军司令员孙汝梅的夫人，她拍拍我的肩膀让我不要害怕，说：“我丈夫讲你是女孩子，很年轻，单独在外面，不放心，所以他们把你带进来，你在这里住下来再说。你不要害怕，你到我们这儿算是幸运了，如果是被日军弄去的话，日本鬼子绝对不放过花姑娘的。”她每天三次送饭进来，问长问短，她说：“你家里条件很好嘛，为什么要出来受这个苦，外面太可怕，太危险了，这要是给日本人抓去了，命也没了。我家也没孩子，你留在这儿，你喜欢唱歌，我们家有钢琴，可以找人教你”。我还是坚持要回抗日义勇队，她捂住我的嘴巴，小声说，“你这样讲被别人听到了，我们司令员也要遭殃。”还有一次，司令员的夫人说，“你要是想回家，路费我们出，把你送回家吧”。我还是坚持说不回去，“我出来就是要打日本的！”

过了大概半个多月，部队以交换俘虏为条件，把我送回了部队。就这样，一个大难关过去了。1939年我任职江苏丰县动员委员会妇女部长。

我是个多灾多难的人，回去又过了半年多，九月份，又碰到了肃托（肃清托洛斯基匪徒）事件，我本来是在丰县做妇女工作，忽然有一次要调我到学习班，刚去听讲课，直到有一天叫我出去，一直带到审判的地方。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八路军四大队的政委王宏鸣，他们三个人站在审判台前，王须仁厉声呵斥：“你老实讲，你是怎么用女色拉大队长参加托匪的！”我说，“什么土匪？我是打日本的。没听说过什么土匪。”他说：“什么土匪！是托匪！托洛斯基匪徒！”我听不懂，王须仁就拿鞭子抽打我，见我还不承认，他就用别的刑法，把我绑到一个凳子上，给我轧杠子、灌凉水，我还是没有认账，又把我绑在电椅上要给我过电。这时候，区党委书记忽然开口，“真想不到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也会是托匪？我看这样吧，她年纪还小，把她押下去，关起来”，让她好好交代。这之后，他们就把我押下去，让我好好想想。

一走进牢房，一看，有地委书记李毅，他大惊失色，觉得很奇怪，怎么把一个小姑娘也关进来了？这时地上还趟着一个人，是保卫科长，他马上爬起来了，哭着说，“小张，我对不起你呀，我对不起你，是他们用刑罚逼着我，说你是参加托派！”说着又哭了，我这才知道原委，也没有办法。

关到牢房之后，过几天就换地方行军走路，有一天晚上又要行军了。结果走着走着，突然有个人跑到我跟前，附着耳朵跟我讲，“你是山西人，从小就参加革命，可你这个命，明天就很难讲了。我身上只有一毛三分钱，你拿了就跑，可能会好一些，要不然明天死活就知道了”。他非常诚恳，也不多讲，说完了话就跑到队伍前面去。后来我想找这个人就找不到了，这一毛三分钱每次反扫荡我都放在衣袋深处，永远也忘不了。

关了大概十几天，山东分局的党委书记郭洪涛，还有八路军一一五师的政委罗荣桓听说了湖西事件。连夜赶来处理，第一天罗荣桓书记就找我谈，说，“你年龄这么小，他们说你是托派，你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你没有问题，你明天就可以出去，我们给你安排工作。”我擦着眼泪走出政委办公室。湖西肃托事件平息之后，区党委恢复了正常工作，我被分配到鱼台县工作。不久，山东分局刘局英部长，离开湖西时，带我去山东抗大学习。

短短两年，遭遇了这么多事情。可那时候觉得回到党的部队了，也知道自己是被冤枉，那一定是别人的错误，我始终相信党。

沂蒙山中一枝花

1940年，中共山东分局及山东省妇联提出组成一个都是由妇女组成的姊妹剧团，来动员妇女支援抗日。他们说，“现在这个张令仪来了，张令仪又会唱歌，让她参加这个剧团的组建嘛。”于是我任姊妹剧团编辑股副股长，音乐股长。

在开始组建的时候，组织说，为了接近群众，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另外我们服装上要改变一下，要穿老百姓的衣服，有个女孩子就哭了，“我不要，我不要，为什么我要脱军装啊。”经再三说服，一切为了便利宣传工作，自己的利益都不考虑了。

姊妹剧团演出，没有部队跟随，都是自己摸索，编剧、搭戏台、排练。开始开展工作的时候很困难，老百姓很封建，不让妇女出来，有的就在门缝里看，后来慢慢的就觉悟了，我们发动了很多很多妇女参加抗战，姊妹剧团一共二十一二个人，在鲁南地区进行宣传，演出

快板、杂耍、活报剧等简单易懂的节目，每次演出结束，很多大娘大嫂拉着我们的手问长问短，老乡们都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我们的演出。

第二年的时候，敌人频频出来扫荡，女孩子们年龄也小，有两个同志长了脚气无法走路，过河的时候，有的女孩子就要背着，我就和张伟强同志一人背一个过河。环境太紧张了，出去工作就是要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姊妹剧团总是受到身体的局限。宣传队吃那么多苦，但干得很起劲，有一次八大剧团表演，我们是唯一的妇女宣传队，得了第三名。我们这些女孩子，功绩不小，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大加表扬。那时候就是不考虑个人，不怕死。

1941 年底，遭遇了一次大扫荡。机关的一些人员，像山东分局、工会、抗日军政大学这些非战斗部队，准备到大青山上去，有的不能走的，就留在老百姓家，能走的就跟着队伍。结果敌人三面包围了大青山，我军牺牲了一两千人。撤退时大家都走散了，山上很艰苦，我跟着三个战友，白天窝在山洞里，晚上探路，绕山头硬是找到了联络人。

1985 年，山东省妇联专门召集了分散在各地的原姊妹剧团团员，那时的二十多个人，只剩七八个。大家一起回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特别是大青山烈士陵园，老团员们回想起牺牲的战友，都抑制不住地痛哭。姊妹剧团虽然只存在短短一年，但我们为沂蒙山区抗日救亡、妇女工作贡献出的努力，功不可没。

抗战尾声

1942 年，我被分配到山东卫生教导队学习，1942 年我患了黑热病，一年多才治好。1944 年进入卫生学校学习，远离了前线，转入后勤工作。结婚后，转入山东省卫生局工作。1945 年 3 月我生下一个女儿，1946 年，国共谈判失败，由于蒋军的狂轰乱炸，我被组织安排在大松林的一个农民家，天气渐暖，一家人才得以团聚。1948 年，全家又投入到淮海战役的前线中。

看看现在的女孩子们，再想想自己年轻的时候。十六七岁时不知道什么生死，只想着抗日救国。想想人的一生，也是非常曲折。